

# 01

“好的学术研究，都是冒险”

致知：是什么原因让你放弃LSE，从伦敦移居香港，来到港大？

李晋：本来在伦敦生活得开开心心，在LSE也有终身教职，在接到港大多次邀请之后，确实对自己也进行过“灵魂拷问”——到底是在LSE能写出更好的文章，还是在港大更能写得出？后来，觉得港大商学院变化更快，潜力更大，就决定冒险。好的学术研究都是冒险。

致知：作为学术成果非常丰富的教授，你是怎样选择要研究的问题的？

李晋：我没那么在乎什么是主流问题，更在乎自己的兴趣。对于我觉得重要的问题，会时时想起一直做，不过很多时候，我会跟随机缘巧合。

比如初到港大的时候，我遇到MIT的师弟罗焯，在聊起Deal or No Deal这个游戏时，我们就开始问——为什么人做决定的时候会“迟疑”？这是现实中普遍存在，但经济学理论框架中却极少讨论的。在经济学传统框架里，理性人一下子就作出决定。这个框架到底丢失了什么信息？罗焯是数学天才，当年的数学奥林匹克(IMO)满分金牌得主。我也对解数学题感兴趣。我们当时很多时间都在办公室，找一些奥数题，罗焯来展示他是怎样一步步推进解题的，从这个过程中，我们一起想办法来研究，人到底是如何思考的。

致知：那么，人到底是如何思考的呢？

李晋：在经济学理论中，人都是理性的，总是有一个对于世界非常准确的描述。而事实上，管理学家詹姆斯·马奇(James March)提到，人的注意力是稀缺的，对世界的理解是有限的。所以很多时候，人就是在给定条件下，考虑如何去分配我们的注意力，然后形成自己的叙事方式。

为什么事后诸葛亮是容易的？事后看时，我们就是将我们的注意力，放到了那些最该关注的因素上。但是在事前，我们有那么多信息就是会漏看，漏算。本来是主要矛盾，却被我们当做了次要矛盾。

## 02

“过度依赖数据，  
会形成信息与思维模型的茧房”

致知：人不能达到“理性”，人会“迟疑”，所以AI是可以完美思考的？

李晋：人工智能确实很重要，算法很重要，但即使拥有了所有的数据，如果不去仔细思考世界是如何运行的话，就很容易通过正确的数据得出错误的结论。而用科学的方法得出的错误结论，有时负面影响会更大。

举个简单的例子。假如我的孩子是平均水平的学生，一般可以拿B，运气好有时候会拿A，运气不好会拿C。我们往往会在拿A时表扬他，拿C时批评他。如果进行大数据统计，我们可能就会发现，表扬之后成绩往往会变差，批评之后成绩一般会变好，从而得出多批评、少表扬的结论。

然而，这样的结论正确么？事实上，很有可能表扬和批评都没用。数据统计得出错误结论的原因是，我们忽略掉了“表扬”或“批评”，这个行为本身是内生的。也就是说，我们表扬孩子时，往往是他考试运气好时。之后孩子成绩下降只是因为他下一次考试运气不再那么好了，和家长表扬完全没关系。

这是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。当我们去识别一个政策是否有效的时候，本身是希望这个政策是“随机”的，不具有内生性，但现实却往往并不如此。而当思维模型不准确时，就会产生一些内生性问题，得出的结论就未必对。基于此分配的注意力就会被扭曲，获取的信息就不是有代表性的。

这样就会形成信息与思维模型的“茧房”，而且会持续自我强化。我和港大同事罗焯还有张晓炜正在做这方面的研究，这是我到港大以后觉得最有意思的研究之一。

致知：区块链、AI、元宇宙，会不会重塑经济学规律？

李晋：经济学的本质其实非常简单，就是趋利避害。我们一般认为人的行为都是基于收益大于成本而作出选择，比如“家国情怀”等也都可以纳入“收益”考虑。区块链、AI等都是技术层面的升级，但经济学基础问题依然存在，根本上依然是研究外部性的问题。

但经济学并非研究单个个体做决策的科学，而是研究一堆人如何决策。交易成本理论是对经济现实的深刻理解。道格拉斯·诺斯（Douglass C.North）的经典理论将交易成本分为两类，一类是衡量成本（measurement cost）——这些用来帮助买家确保所买的物品和服务也是他想要的，一类是执行成本（enforcement cost），用来确保合约可以被执行。区块链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执行成本，但对大多数交易来说，衡量成本仍然存在。如果只是简单的去中心化，交易成本（相对传统组织）反而会更高，效率更低下。

另外，现实世界很复杂，我们只能理解一点点。而且我们人类理解社会，总是觉得人是主体。为什么技术不可能是真正的主体？可能技术的演化有它自己的逻辑，人类可能本质上只是“工具人”，毕竟我们还没有办法证伪我们是否生活在一个“Matrix”当中。

元宇宙是一个新的科技，会帮助我们更好的创造自己。但像所有技术一样，也会带来焦虑，短期甚至外部性更大，但我们需要思考的永远是如何共存，更好的用经济规律来帮助人。

## 03

“躺平，是走向更好社会的必经之路”

致知：现实世界确实充满似是而非。比如近期席卷社交媒体的“内卷”与“躺平”，还有非常盛行的“宇宙的尽头是编制”的说法，以及对“阶层固化”的忧虑。在你看来，当下的年轻人真的不想奋斗了么？

李晋：大家确实一直在讨论这些问题。我其实很好奇，有没有很好的研究真的可以证明年轻人有很多放弃努力。

我们需要看到问题背后的本质。当整个经济在持续增长时，每个人都有机会。但整个经济不可能一直保持高速增长，所有的增长模型证明到最后都会条件收敛，增长速度会慢慢降下来。而这时候，好的职位都是被占着的。

以日本为例，战后重建阶段，好的职位持续被创造，一大批优秀企业家喷薄而出。但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，这批优秀的企业家依然年轻，他们就可以在重要职位上继续待很久很久。这对年轻人而言，就没有那么多机会。

不管外界环境如何，人内在都是一样的，即好处大于坏处，就会去做。特别是靠上一点的年轻人，因为还有上升机会，就会“内卷”。因为经济发展阶段、结构性问题等因素，上升需要付出的成本更多，而机会又比原来更少，但依然有人愿意更加努力，积极参与竞争。

当发现上升的机会非常渺茫时，部分人就选择“躺平”。

“内卷”和“躺平”，都是现象，而不是问题。尤其是“躺平”，我觉得它是慢慢走向更好社会的必经之路。

致知：你觉得“躺平”，是一件好事？

李晋：是的。“内卷”，是希望在社会主流价值观当中得到认同。而“躺平”，就是创造自己的价值评价标准。

过去几十年，中国包括整个亚洲社会价值观都太单一，拥有多少财富，这一个标准被用来评价所有人。这就产生一个问题——社会作为一个整体，大家都不快乐。社会没有给予大家足够的空间，让大家觉得自己好。

社会学家欧文·戈夫曼(Erving Goffmann) 强调，人有很多个“self”。比如我，既是教授、学者，也是父亲、丈夫。球迷，粉丝，教徒，爱国者，这些都是“self”。我从哪个角色得到的回报更多，我可能就会将自己更多评价的比重向其倾斜。

再比如，假设全世界排名前20的经济系有50个，擅长微观经济学的可以去选择微观经济为主的排名，擅长宏观经济学的可以去选择宏观经济为主的排名，擅长计量经济学的可以选适合自己的排名。每个经济系都觉得自己全球前20，大家都开心。

当把一个维度变为多个维度，每个维度又增加更多灰度之后，其中的每个个体都可以找到自己的价值，让自己感受到自己的存在。

说到底，每个人都是在创造自己，都有感知自己存在的需求。我们都希望社会有一个好的结构，每个人的潜能可以得到更大程度地发挥。

致知：这背后的经济学道理是什么？

李晋：我非常喜欢富兰克·奈特 (Frank Knight) 的一个说法。他说，我们的生产力比100年前不知道提高了多少倍，但我们的工作时间并没有被减少，大家还是在辛苦工作。

之前我在读一本书，《Four Thousand Weeks》。一年大约有50个星期，所以4000个星期是人类大概的生命长度。作者本来就是在纽约时报教大家怎样进行时间管理。但他后来发现，他时间管理做得最好的时候，反而是最不快乐的时候，极其易怒。就连在开车的时候，也非常容易“路怒”。他忽然觉得，优化太好之后，稍微有些不在掌控，就会很不开心。

我们很多时间其实都是在忙碌地做无用功。从经济学角度来看，依然是外部性的问题。

一个个体本来可以按照自己的节奏，做好自己的事。但当节奏被打破，人和人竞争加剧，进入“被卷”，加大内耗，造成外部性问题。

致知：但是从个体来讲，我希望努力做到更好，难道有错么？

李晋：最近刚刚获得2022年“菲尔兹奖”的June Huh有个非常有趣的观点，他认为，意愿和意志，都被高估了。

他觉得自己没有办法一定要做成什么事，不过是在自己熟悉的领域漫步，然后就总能找到通往自己想做的事情的小路。

他中学去做诗人，后来又去做记者，之后又回到大学，结果去旁听，却获得了数学奖。我非常喜欢这个故事。他之前带着记者在附近徒步，那里他走了一百次了，但他依然迷了路。关键是他对于自己迷路，非常接受，非常放松。

这种心态，非常重要。

致知：当前年轻人面临的处境其实并不新鲜，为何“内卷”和“躺平”会在社交媒体有如此多的受众？

李晋：很多时候我们关注一个现象，是关注很多人跟自己很像。他们内卷，就好像对我的内卷有很多人感同身受；他们躺平，让我看到很多人跟我一样，让我感觉到，并非只有一种被接受的生活方式。

## 04

“好的社会，需要多元的选择标准”

致知：“内卷”与“躺平”现象突出，政府是否需要出手干预？“宇宙的尽头是编制”是否会带来人才配置的低效率？

李晋：政府要不要作为，往往面临两种情境。一种是现实环境很差，有所作为会让情况变好；另一种是现实环境很差，但有所作为会让情况更差。

问题的关键在于，要去识别现实是哪一种情境。就像我们常说的，改变能改变的，接受不能改变的。最难的在于，弄清楚“which is which”。

通常来讲，政府可以完善制度规则，搭建基础设施，但不要下场自己做。从经济学角度而言，如果政府下场是有用的，那么一般来说会有其他的形式更有用。

要打破“内卷”，恰恰就是要鼓励竞争。让更多的雇主出现，有更多的筛选标准存在。市场就是鼓励竞争的，且不是只有单一标准。

以我在研究的战国时期为例，为何战国是黄金时代？因为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偏好，可以根据自己的标准去选择人才。长期而言，市场对于人才配置是更重要的。

## 致知：政府还能做些什么？

李晋：政府可以搭建基础设施，完善制度规则，还可以定义什么是重要的，塑造社会主流价值观，为个人实现多元价值创造可能性。这都是个人没有办法实现的。

罗纳德·哈里·科斯（Ronald H. Coase）有一篇岌岌无名的文章，关于“思想市场（idea market）”，但非常有意思。他认为，我们可以监管商品市场，那么就可以监管思想市场。比如现实市场可以反垄断，为什么思想市场不可以反垄断？思想文化领域也是有外部性的。

思想市场如何设计，对世界长期文明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事情。

编辑：王晨

《致知·20人》是香港大学北京中心2022年起全新策划的教授观点访谈志。在中心成立一周年之际，依托港大百年学术、人文积淀，发挥经管学院商学优势，汇聚知名教授、学者智慧碰撞，分享大变局时代下的思考与探索，共探多重挑战下的应对之道。《致知·20人》与思想者对话、与智慧者同行，2022开启寻觅知新征程！